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高丙中 主编

WITCHCRAFT,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 阿赞德人的 巫术、神谕和魔法

[英] 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

〔英〕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 著

覃俐俐 译

商务印书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英)普里查德著;  
覃俐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ISBN 7-100-04825-7

I. 阿… II. ①普…②覃… III. 阿赞德人—巫术—  
研究 IV. B99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751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

〔英〕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 著

覃俐俐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825-7/C·135

---

2006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7 1/4

定价: 50.00元

##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书目

\*《写文化》

[美] 詹姆斯·克利福德 编  
乔治·E. 马库斯

\*《象征之林》

[英] 维克多·特纳 著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

[英] 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 著

《纳文》

[英] 格雷戈里·贝特森 著

《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

[英] 埃德蒙·利奇 著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美] 保罗·拉比诺 著

《萨摩亚人的成年》

[美] 玛格丽特·米德 著

《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

[澳] 德里克·弗里曼 著

《制造同意》

[美] 迈克尔·布若威 著

《过渡礼仪》

[法] 阿诺尔德·范根内普 著

\* 号为已出版

责任编辑：李 霞  
封面设计：张金标

##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 总 序

学术并非都是绷着脸讲大道理，研究也不限于泡图书馆。有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研究者对一个地方、一群人感兴趣，怀着浪漫的想象跑到那里生活，在与入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他们生活的故事，最后又回到自己原先的日常生活，开始有条有理地叙述那里的所见所闻——很遗憾，人类学的这种研究路径在中国还是很冷清。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民族国家都要培育一个号称“社会科学”（广义的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的专业群体。这个群体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被期望扮演多少不同的角色，都有一个本分，就是把呈现“社会事实”作为职业的基础。社会科学的分工比较细密或者说比较发达的许多国家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展出一种扎进社区里搜寻社会事实、然后用叙述体加以呈现的精致方法和文体，这就是“民族志”（ethnography）。

“民族志”的基本含义是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希罗多德对埃及人家庭生活的描述，旅行者、探险家的游记，那些最早与“土著”打交道的商人和布道的传教士以及殖民时代“帝国官员”们关于土著人的报告，都被归入“民族志”这个广义的文体。这些大杂烩的内容可以被归入一个文体，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它们在风格上的异域情调（exotic）或新异感，二是它们表征着一个有着内在一致的精神（或民族精神）的群体（族群）。

具有专业素养的人类学家逐渐积累了记述异民族文化的技巧,把庞杂而散漫的民族志发展为以专门的方法论为依托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这就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科学的民族志”。人类学把民族志发展到“科学”的水平,把这种文体与经过人类学专门训练的学人所从事的规范的田野作业捆绑在一起,成为其知识论和可靠资料的基础,因为一切都基于“我”在现场目睹(I witness),“我”对事实的叙述都基于对社会或文化的整体考虑。

民族志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所磨砺出来的学术利器,后来也被民族学界、社会学界、民俗学界广泛采用,并且与从业规模比较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结合,发展出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

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既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即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这些学科本来就擅长定性研究,它们引入民族志的定性研究,使它们能够以整体的(holistic)观念去看待对象,并把对象在经验材料的层次整体性地呈现在文章里。民族志是在人类学对于前工业社会(或曰非西方社会、原始社会、传统社会、简单社会)的调查研究中精致起来的,但是多学科的运用使民族志早就成为也能够有效地对西方社会、现代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的方法和文体。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的奠基人,涂尔干强调对社会事实的把握是学术的基础。社会科学的使命首先是呈现社会事实,然后以此为据建立理解社会的角度,建立进入“社会”范畴的思想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磨砺有效呈现社会事实并对其加以解释的方法。

民族志依据社会整体观所支持的知识论来观察并呈现社会事实,对整个社会科学、对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具有独特的知识贡献。中国古训所讲的“实事求是”通常是文人学士以个人经历叙事明理。“事”所从出的范围是很狭窄的。现代国家需要知道尽可能广泛的社会事实,并且是超越个人随意性的事实。民族志是顺应现代社会的这种知识需要而获得发展机会的。

通过专门训练的学者群体呈现社会各方的“事”，使之作为公共知识，作为公共舆论的根据，这为各种行动者提供了共同感知、共同想象的社会知识。现代社会的人际互动是在极大地超越个人直观经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展开的，由专业群体在深入调查后提供广泛的社会事实就成为现代社会良性化运作的一个条件。现代世界不可能都由民族志提供社会事实，但是民族志提供的“事”具有怎样的数量、质量和代表性，对于一个社会具有怎样的“实事求是”的能力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社会需要叙事，需要叙事建立起起码的对社会事实的共识。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有事实就出议题，有议题就能够产生共同思想。看到思想的表达，才见到人之成为人；在共同思想中才见到社会。新闻在呈现事实，但是新闻事实在厚度和纵深上远远不够，现代世界还需要社会科学对事实的呈现，尤其是民族志以厚重的方式对事实的呈现，因为民族志擅长在事实里呈现并理解整个社会与文化。这是那些经济比较发达、公共事务管理比较高的国家的社会科学界比较注重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事实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中，民族志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的许多缺陷。学术群体没有一个基本队伍担当起民族志事业，不能提供所关注的社会的基本事实，那么，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事实”太不一样并且相互不可知、不可衔接的状态下，学术群体不易形成共同话题，不易形成相互关联而又保持差别和张力的观点，不易磨炼整体的思想智慧和分析技术。没有民族志，没有民族志的思想方法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扩散，关于社会的学术就难以“说事儿”，难以把“事儿”说得有意思，难以把琐碎的现象勾连起来成为社会图像，难以在社会过程中理解人与文化。

因为民族志不发达，中国的社会科学在总体上不擅长以参与观察为依据的叙事表述。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在运作中所需要的对事实的叙述是由文学和艺术及其混合体的广场文艺来代劳的。收租院的故事，《创业史》、《艳阳天》，诉苦会、批斗会，都是提供社会叙事的形式。在这些历史时期，如果知识界能够同时也提供社会科学的民族志叙事，中国社会对自己面临的问题的判断和选择会很不一样。专家作为第三方叙事对于作



为大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在内部维持明智的交往行为是不可缺少的。

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还是一种发现或建构民族文化的文体。民族志学者以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的方式开展调查研究，他在社会中、在现实中、在百姓中、在常人生活中观察文化如何被表现出来。他通过对社会的把握而呈现一种文化，或者说他借助对于一种文化的认识而呈现一个社会。如果民族志写作持续地进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文化上的丰富性就有较大的机会被呈现出来，一度被僵化、刻板化、污名化的文化就有较大的机会尽早获得准确、全面、公正的表述，生在其中的人民就有较大的机会由此发现自己的多样性，并容易使自己在生活中主动拥有较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社会拥有各种更多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界无法回避民族志发育不良的问题。在中国有现代学科之前，西方已经占了现代学术的先机。中国社会科学界不重视民族志，西洋和东洋的学术界却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民族志，描绘了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图像。这些图像是具有专业素养的学人所绘制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基于社会事实。然而，我们一方面难以认同它们是关于我们社会的完整图像，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生产出足够弥补或者替换它们的社会图像。要超越这个局面中我们杂糅着不服与无奈的心理，就必须发展起自己够水准的民族志，书写出自己所见证的社会图像供大家选择或偏爱、参考或参照。

这个译丛偏重选择作为人类学基石的经典民族志以及与民族志问题密切相联的一些人类学著作，是要以此为借鉴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推动民族志研究，尽快让我们拥有足够多在学术上够水准、在观念上能表达中国学者的见识和主张的民族志。

我们对原著的选择主要基于民族志著作在写法上的原创性和学科史上的代表性，再就是考虑民族志文本的精致程度。概括地说，这个“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的入选者或是民族志水准的标志性文本，或是反思民族志并促进民族志发展的人类学代表作。民族志最初的范本是由马林诺夫斯基、米德等人在实地调查大洋上的岛民之后创建的。我们选了米德的代表作。马

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最重要的开创之作，好在它已经有了中文本。

我们今天向中国社会科学界推荐的民族志，当然不限于大洋上的岛民，不限于非洲部落，也不应该限于人类学。我们纳入了社会学家写美国工厂的民族志。我们原来也列入了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描写英国工人家庭的孩子在中学毕业后成为工人之现象的民族志著作《学会劳动》，后来因为没有获得版权而留下遗憾。我们利用这个覆盖面要传达的是，中国科学学的实地调查研究要走向全球社会，既要进入调查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也要深入西洋东洋的主要发达国家，再高的成本，对于我们终究能够得到的收益来说都是值得的。

这个译丛着眼于选择有益于磨砺我们找“事”、说“事”的本事的大作，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本事的不足是中国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软肋。关于民族志，关于人类学，可译可读的书很多；好在有很多中文出版社，好在同行中还有多位热心人。组织此类图书的翻译，既不是从我们开始，也不会止于我们的努力。大家互相拾遗补缺吧。

高 丙 中

2006年2月4日立春

# 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学术轨迹(代译序)

翁乃群

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是一位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著述丰厚、影响广深的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1937年首次出版的《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是他基于1926年到1930年期间三次累积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所撰写的第一部田野志专著。该著作与他于1940年发表的《努尔人——对尼罗河流域一族群生计方式与政治制度的描述》后来都被视为代表他所处时代的人类学经典之作。他也因此被后人视为现代社会人类学奠基人之一。商务印书馆出版《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的中译本，无疑将有助于学人在对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学术建树有更多了解的同时，也对在我国仍处于潜学地位的人类学，和上个世纪中叶欧美人类学研究及其学理发展脉络有更深入的认识。

1902年埃文思-普里查德出生于英格兰的萨塞克斯。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他学的是近现代史。毕业以后他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该系心理学派人类学家塞利格曼和功能学派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最早的田野研究经验就是参加塞利格曼主持的尼罗河流域社会文化研究。1935年埃文思-普里查德受牛津大学之聘任非洲社会学讲师，使他获得了与功能结构学派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进行更多接触和学术交流的机会。正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学理论取向，对他后来的社会人类学理论建树有着比其前述两位导师更大的影响。他始终遵循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长时段深入的参与式田野调查方法。在马氏之前，尤其是在19世纪文史哲影响下，人类学者的研究资料主要依赖传教士、旅行者、商人、殖民官员的著作，而不是靠自己进行系统化的田野研究。马氏之前的人类学者还相信把这些碎片化的资料纳入他们的理论便成为客观的事实，而

从来没有担心它们会受到理论建构的歪曲。比起马氏缺乏理论构架和系统化的田野研究,埃文思-普里查德更欣赏布朗依据社会学所进行的框架和观念的系统化的田野研究,在他看来,后者更具有明确的调查范围以及更严格控制的比较研究。虽然他的两位导师以及布朗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止于模仿或简单继承他们的学术主张,而是在自己的学术实践和理论创造中追求对他们的超越。

1939年二战爆发,埃文思-普里查德参了军。他在阿比西尼亚参与组织了阿努厄人(Anuak)和居住在该地区与埃塞俄比亚交界的其他族群抗击在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驻军的战斗。这是他参军后参加的第一场战斗。后来他因通晓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而被派驻到叙利亚任行政官员。1942年底他被派到英军驻昔兰尼加(现为利比亚东部一地区)军管部门任行政官员。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贝多因游牧族群之中。虽然在这期间他不能开展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研究,但后来他还是根据这一段的经验,发表了《昔兰尼加的塞努西教团》(*The Sanusi of Cyrenaica*)一书。在该书中他主要利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分析了一个基于亲族关系的社会如何发展成中央集权政治社会的过程。该书被认为是研究该地区社会历史变迁的权威性著述。

1945年从军队复员后,他即被剑桥大学人类学系聘为高级讲师。一年后,他转到牛津大学人类学系接替退休了的拉德克利夫-布朗任系主任。1951年他出版了关于努尔人研究的第二部著作《努尔人的亲属制度和婚姻》。1956年他关于努尔人的第三部著作《努尔人的宗教》出版。与涂尔干关于宗教的观点——认为社群通过对某些社会集体符号的崇拜达到崇拜社群自身——不同,埃文思-普里查德认为宗教并非滋生于社会结构,也不受社会结构所制约。他认为对宗教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弄清楚人们相互间是以何种方式解释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的错综复杂。

1950年冬,埃文思-普里查德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三台节目向普通听众就社会人类学研究范畴及其方法等问题作了一系列讲座。第二年该系列讲座以《社会人类学》为题出版。1956年出版的《原始社会中妇女的位置》是他的第二本论文及讲演集。他在1930年代的论文后来被汇编成集,以

《赞德人的魔法师》(*The Zande Trickster*)为题。而1926年至1936年他在东非英属埃及和苏丹开展田野研究工作期间的著述均收集在1930年代出版的《苏丹札记》系列资料中。

埃文思-普里查德认为人类学是“启蒙运动之子”。在法国,该学科从其开始就受到了百科全书派哲学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到首先提出创建研究社会的科学的圣西门的影响。而后来该科学被圣西门的学生孔德称为社会学。正是这些18世纪法国学术思想,在上个世纪初通过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及其学生莫斯(Marcel Mauss)和列维-布留尔(Levy-Bruhl)的著作,对英国社会人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渊源则源自18世纪苏格兰伦理哲学家休谟、亚当·斯密、斯图尔特、亚当·福格森等的思想。而他们的灵感则源自培根、牛顿等。虽然他们也曾受到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影响,但与上述法国的学术思想不同,在他们看来,社会与自然体系或有机体并无不同。因此他们主张对社会的研究就应该像物理学家研究物理现象一样,是实验性的,并能够用归纳法探寻出其通则和规律。虽然在这样的学术脉络下他们都强调经验主义,但他们的研究更多地依赖于内省和推理而不是对真正社会的观察。他们将抽离了情境的事实用于说明或证明他们靠严密推理而得到的结论。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轨迹下,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系列对社会制度的系统研究。梅因的《古代法》、巴霍芬的《母权论》、库朗歇的《古代城市》、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泰勒的《人类早期历史的研究》,以及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经典之作,便是这一学术时代的代表性成果。这种不是建立在通过自己长期深入的田野观察的人类学研究一直到马林诺夫斯基时代才得以被改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学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追求“客观性”。现象学对这种“客观性”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要了解一个社会或文化不可避免必需依靠“意识”(consciousness)和“反省”(reflection)(即主观性。——作者)的经验,而这正是人类具有的独特性。面对现象学的批评,一些社会学者便放弃对客观性的追求陷入到自身的主观性之中。而另外一些坚持追求客观性的学者,则不顾这些

批判继续遵循旧有的研究方法。这正是埃文思-普里查德步入人类学领域时,所面对的学界两难局面。而他后来的学术实践和论述表明,他一方面拒绝将社会文化研究化约为见不到个人主体能动作用的社会客观性,同时也不放弃对具有“客观性”的比较研究的追求。他对阿赞德人巫术、神谕和魔法的研究,就是对人们社会生活中遭遇不幸的责任追究这一普遍现象的不同处置方式的研究。当遭遇不幸,是指控他人或自负责任,不同处置方式其背后必然有着社会本身的合理解释。而这些合理解释(意识层次)和不同处置方式(行动层次)构成不同社会对遭遇不幸的特种处理系统。他的研究中既考虑到文化理性,也顾及到历史的情境。

在学理取向上,埃文思-普里查德不赞同诸如里弗斯(W. R. Rivers)、哈登(H. C. Haddon)及佩里·史密斯(Perry Smith)等由自然科学学科转向人类学的学者们对人类社会文化和意识的研究的自然科学导向,即将人类社会及其意识视为像自然现象那样按照某种自然法则运行的体系。他认为社会是一个伦理体系而非自然体系,因此人类学研究社会探寻的是社会型构,而不是社会过程,是模式而不是科学规律,是对社会的翻译而不是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埃文思-普里查德更接近于涂尔干、莫斯和列维·布留尔等法国社会学家的学说。在他的研究实践和倡导的方法论中,特别强调对社会文化情境和意义的探究。他认为人类学与追求普世性规律的自然科学不同,应以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为模式。正因如此,他通过在研究中对社会文化情境和意义的特别关注,将其功能学派前辈放弃了的历史学方法重新引入到人类学研究方法中。他后来的研究实践和理论建树证明他对学术前辈们方法论的超越。这主要表现在他的研究在关注文化意识、社会制度的同时,也探讨生活在文化意识和社会制度下并受其制约的社会能动主体对文化意识和社会制度的支撑和构建作用。

埃文思-普里查德与他前辈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把日常知识作为其研究的最重要内容,并预言了后来研究日常生活社会学的发展。自19世纪以来,许多社会人文学者将研究关注点集中在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学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象学的发展使这种趋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对普通人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如何运用普通常识的社会学。埃文思-普里查

德认为责任追究体系是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具有普世性的现象,但不同社会有其不同的责任追究体系。在阿赞德社会开展参与式观察田野调查时,他发现的巫术信仰以及社会机制就是纷杂多样的责任追究体系中的一种。

玛丽·道格拉斯认为在学理上,埃文思-普里查德还受到博览人类学著作的剑桥实验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莱(Frederick Bartlett)的影响。巴特莱认为认知的过程是对感官所接受的信息作的选择与组织;但他确信作为认知主体的个人具有社会属性,认为对感官所接受信息的选择则必然受到社会经验的影响。在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许多论述中,人们不难看到巴特莱上述观点的影响。而这又与意大利哲学家雷那诺(Eugenio Rignano)关于注意力的“记忆解释”(memoric explanation)有着学理脉络的关系。在他1934年发表的“列维-布留尔关于原始心智的理论”一文中指出:“一如詹姆士,雷那诺以及其他若干学者所证明的,不论何种声音或影像,传抵一个人的脑部,并不一定会进入他的意识。我们可以说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潮涌而入的感觉印象中,只有少数能以其较强的影响力通过选择成为意识印象。一个人的兴趣所在就是他从事选择的依据,而这些兴趣绝大部分是由社会决定的,因为它通常就是一个社会所有成员赋予某一客体的价值,对个人对该客体的注意与否具有指导的作用。因此,认为野蛮人都神秘地认知,或说他们的知觉都是神秘的,乃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我们可以这样说:野蛮人之所以对某些现象特别注意,乃是基于社会所赋予这些现象的神秘特质,而他们对这些现象的兴趣主要地,甚至完全地,也就是针对这些神秘的特质而产生”(玛丽·道格拉斯 1982:55-56)。在埃文思-普里查德看来,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既不能通过抽象的思辨,也不能只从许多他人的民族志中选取资料,而要靠严格控制的、深入的田野研究进行系统化的资料搜集。正是在这样的学理认识上,他实践着自己的学术追求,对学科发展作出了学术贡献。

从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学术实践和理论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了解到上个世纪中叶欧美人类学学科话语、学术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历程。毋庸讳言,埃文思-普里查德对东北非,特别是对二战前英属埃及、苏丹殖民政府管辖下尼罗河流域多个族群的社会制度进行的人类学田野研究,无不表明当时

英国社会人类学学术实践和发展与英国海外殖民统治的暧昧关系。在当时,正是英国海外殖民统治为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学术驰骋的广阔天地。但更值得指出的是,借着深入细致且系统化地对人们遭遇不幸的反应的田野研究,埃文思-普里查德从出版这本民族志开始,就在人类学发展史上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地位。

### 参考文献:

- Bohannon, P. & M. Glazer. 1988. "E. E. Evans-Pritchard 1902—1973", in P. Bohannon & M. Glazer eds. *High Points in Anthropology*. second edition. McGraw-Hill, Inc.
- 玛丽·道格拉斯著,蒋斌译,1982,《原始心灵的知音——伊凡普里查》。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http://www.mnsu.edu/emuseum/cultural/anthropology/Evans-Pritchard.html>



**献 给**

**梅杰·P. M. 拉肯**

(1911—1932 年在赞德地区任地区专员)

以纪念他为阿赞德人所做的工作  
和我们的友谊